

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及启示

张颖^{1,2}, 谢妍¹

(1. 江西师范大学 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国际教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41)

摘要: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构建橄榄型社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日本在战后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造稳定的橄榄型社会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模式。以日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视角,从产业结构、劳动体系、育人机制和社会模式四个维度分析日本打造橄榄型社会的举措与经验,认为其对增加日本国民收入、稳定就业人数及提升社会观念认同度有重要作用。鉴于日本经验,我国应从确立经济、社会、国民三位一体的发展思维、构建“四活跃”全民社会模式、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三方面着手,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关键词:日本;中等收入群体;橄榄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F110;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98(2021)05-0064-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我国人均GDP达9771美元^[1],已经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市场相对疲软,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更是维护社会稳定、抵抗各种经济风险以及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未来我国要逐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通过优化社会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并将此作为发展目标写入党的文件^[2-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是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和中坚力量,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重要基础。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苏并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打造了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且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建设了至今仍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社会,在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率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并一跃成为七国集团(G7)当中亚洲唯一的代表。可以说,日本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围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发展模式与理念,探讨其成功经验及教训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水平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日本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最早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关注中产阶级(也称中间阶层)的发展与壮大。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社会科学领域知名学者大桥隆宪、尾高邦雄、安田三郎等以诸多社会阶级理论为基础,开启了对中间阶层研究的序幕。此后,日本政府实施的“国民生活调查”中对“生活程度”回答“中等”的人数从1958年的72%上升至1973年的90%。加之日本社会学会调查委员会实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SSM调查)也同样验证了中间阶层急速增大的事实,引发了围绕“新中间阶层”“阶层归

收稿日期:2020-10-06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16YB034)

作者简介:张颖(1965-),男,辽宁沈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和社会学;谢妍(通信作者)。

属意识”(中流意识)和“总中流社会”的研究。

在“新中间阶层”的研究上,主要围绕探讨其阶层定义及性质。村上泰亮(2012)认为“新中间阶层”是生活样式及意识都呈现均一性的庞大阶层,富永健一在村上的研究基础上指出这一庞大的中间阶层实际上是由地位不一致的多种阶层组成的集合体^[5]。高坂健次(2000)总结了20世纪60至90年代日本学者对中间阶层的争论,并把对中间阶层的研究总结为“阶级政治”“地位政治”及“生活政治”三个阶段^[6]。

在“阶层归属意识”的研究方面,主要考察影响阶层归属意识的因素及探求其出现的原因。神林博史(2010)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一亿总中流”社会现象中体现的“中流意识”,认为这实际上是国民阶层归属意识的体现,同时又与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变量及生活满足感有关^[7]。吉川徹(1999)分别以1975年至1995年的SSM调查数据和国民生活调查数据为对象,进一步探讨阶层归属意识与教育、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8]。而藤森俊辅(1983)则提出“中流意识”会受收入、职业和生活满足意识等因素影响而产生意识分化的现象^[9]。

在“总中流”社会研究方面,由于90年代日本遭遇泡沫经济的打击,股价狂跌、经济失速、社会信用体系崩溃,导致“一亿总中流”的观念遭受冲击,指责社会“不平等”的声音逐渐增强,2000年以后甚至出现了议论“格差社会”的热潮。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中间阶层的研究逐渐把目光转向“社会公平平等”和“中流社会崩坏”等方面。橘木俊诏(2019)在《格差社会》一书中认为不平等的趋势仍在进一步加剧,甚至变得更为严重^[10]。三浦展(2007)更是直言日本“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一亿人口中流化、平等化”的社会模式已经发生了动摇,中流化模式面临着失效危机,进而转变为“阶层化、下流化”的新模式,这些观点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极大关注^[11]。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探究引起格差社会的原因,例如直井优(1987)、尾嶋史章(2002)研究阶层结构与教育的关系^[12-13],佐藤嘉(2009)进一步从教育、青年层、职业、世代间移动和收入五个侧面探讨现代日本阶层结构的流动性及差距^[14]。伦森口千晶(2017)则以比较经济史的角度研究收入差距,探讨日本从总中流社会变成格差社会的原因^[15]。

中国学者对日本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主要从中日比较视角围绕日本“中间阶层”社会阶层流动、“中流意识”以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方面展开。王奕红(2003,2009)较详细地梳理了日本中间阶层问题研究的内容,通过分析比较两国中间阶层的性质特点,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具有阶层形成的意识形态性、阶层意识的薄弱性、阶层状况的弱势性等阶层特点^[16-17]。杨丽梅(2007)、李国庆(2014)分别从“国民皆中流”背后的社会阶层流动以及社会和谐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中流社会结构,探讨了日本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原因及经验^[18-19]。崔健(2007)着眼于日本从“一亿中流”滑向“阶级社会”的现实状况,分析了日本的阶层与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20]。

在研究日本中流意识方面,刘迪(2011)认为战后的城市化运动、教育水平和税收制度这三大因素形成了日本中产阶级及中流意识^[21]。杜伟和唐丽霞(2004)则持相反观点,他指出“中流意识”实际上在各个先进国家中都有出现,日本却明显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在内^[22]。围绕政策方面,张可喜(2013)认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一亿总中流社会^[23]。张车伟等(2010)、张凤林(2011)通过考察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做法及效果,认为参考、借鉴日本方面的成功做法对我国有重要意义^[24-25]。

此外,以国际比较为视角的研究有马晓河(2011)以日本、韩国、巴西三国的“中等收入转型”经验教训为例,分析了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压力和需求结构调整的困境,并提出了化解思路^[26-27]。李实等(2019)在深入剖析了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后,认为应该参考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的成功历史经验^[28]。

纵观以上的国内外先行研究,可以发现日本学者主要围绕社会公平稳定、阶层归属意识等视角研究中间阶层,而中国学者则较多探讨日本“一亿总中流”现象背后的原因及影响因素,并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台看作是日本成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志。同时通过国际比较,肯定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做法,但对日本扩大中间阶层的各项政策与其构建橄榄型社会举措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因此,本文以产业结构、劳动体系、育人机制和社会模式四大维度为研究视角,综合探析日本构建橄榄型社会的主要举措及经验,以期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日本战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举措

(一)确立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导向的经济政策

日本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息息相关。如表1所示,战后

日本政府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鼓励企业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使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具体而言,通过实施“贸易立国”战略、“技术立国”战略、“IT 立国”战略、“新 IT 国家”战略,大力引导和扶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其主要目的是提高经济增长动力,让经济充满活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国民收入。

表 1 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演变^[29-36]

年份	相关政策	内容
1957	新长期经济计划	首次提出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基本政策
1963	通商产业构想	首次提出构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统一政策体系
1971	产业结构构想	确定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转型为知识集约型的加工装配工业
1979	新经济社会 7 年计划	对 80 年代产业结构转换进行设计与引导的第一次系统尝试
1980	通商产业政策展望	实施科技发展新战略,提出“技术立国”方针
1990	通商产业政策	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为适应性强、充满活力的高质量类型
2000	IT 国家基本战略	确立“IT 立国战略”
2001	E-Japan 战略	提出在 2005 年内要将日本建设成为世界最先进 IT 国家
2004	ICT 政策大纲	在 E 系列基础上升级为 U 系列,制定 U-Japan 战略
2009	I-Japan 战略 2015	由 U 系列升级为 I 系列,制定日本中长期信息技术发展目标
2013	创建最尖端 IT 国家宣言	建立以发展开放公共数据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日本“新 IT 国家战略”(2013—2020)
2014	智能日本 ICT 战略	实现国内与国际战略的协同,通过 ICT 战略实现产业创新
2016	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	抓牢第四次产业革命,推动 AI 科研开发与产业化,推广大数据服务应用于社会
2018	未来投资战略	开展“5.0 超智慧社会”计划,推动 AI、物联网(IOT)、机器人等自动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献[29]—[36]整理。

如表 1 所示,1955 至 1969 年间的重化工业时期,日本政府首次在《新长期经济计划》中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本目标,并在《通商产业构想》中将其统一并完善为政策体系,确立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框架。通过此次升级,日本先后出现了“岩户景气”和“伊弉诺景气”。1956—1969 年实际 GDP 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年均增长 9.7%,国民总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年均增长 9.6%,劳动者人均报酬增速更是从 1956 年的 6.9% 飙升至 1969 年的 15.8%,几乎翻了两番^[37]。1970—1980 年期间,在遭遇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朝着高效节能、劳务供给高级化的方向转变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此阶段的政策主要着眼于产业转型,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前框架基础上出台《通商产业政策展望》,勾画产业结构转型蓝图,并确立了“技术立国”方针。虽然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时期,又遭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但实际 GDP 水平仍保持年均增长 4.8%,实际国民收入也年均提高 5%^[37]。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原有相关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框架体系,出台《通商产业政策》,明确要求产业结构要健康发展,大力提倡经济发展科技化、信息化,打造具有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并于 2000 年出台《IT 基本法》,实施“IT 立国战略”。2001 年后陆续出台 IT 立国战略政策的升级版,构建高度信息化的“数字”网络社会。2013 年出台被视为确立“新 IT 国家战略”标志的《创建最尖端 IT 国家宣言》,重点关注大数据应用,由“数字”产业创新升级为“大数据智能”产业创新。2016 年提出的“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中更是强调要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朝着建设 21 世纪数据驱动型社会的目标转变。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提出经济发展新战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遭遇了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经济增长率一度低迷不振,但依靠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日本科技产业排名始终位于世界前列,GDP 总量也稳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位。

(二) 构建广泛多样的劳动方式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的配套设施在经历了 20 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逐渐老化陈旧,生产与生活之间严重失衡。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注重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打造高质量的经济与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并存的发展格局,由此提出了向生活大国转变的口号。

1988 年,竹下登内阁在《经济运营 5 年计划》里提出尽可能实现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和全年总劳动时间 1800 小时,普及双休制,由国家机关带头引进星期六放假休息,尽早实现学校一周 5 天制^[38]。目的是缩短

劳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充实国民业余生活,刺激内需。但这个计划只是提出大体方向,并未进一步实施。直到1992年,日本政府提出《生活大国五年计划》,将全年1800小时的劳动时间设为具体指标,计划于1996年开始在全国实施。具体包括缩短每周工作日、增加节假日、延长带薪假期、减少加班时间等^[39]。

虽然日本政府颁布了相关政策,但执行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原因在于日本企业充斥着严重的加班文化,日本的《劳动基准法》里对加班时间并无限制,给了企业变相延长劳动时间的理由和借口,加之90年代初期的泡沫经济使日本经济陷入泥潭,导致过度加班成为常态。由于缺乏足够的休息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重压之下跳楼自杀的例子比比皆是,劳动方式和工作效率陷入了僵化阶段,整个社会仿佛失去了活力。可以说,不管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以及从劳动者自身的角度出发,转变劳动工作方式都迫在眉睫。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府认为合理协调工作和生活对提高日本社会的活力与增长大有裨益,并将其定位与提升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高度。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开始在社会各界大力宣传和鼓励国民兼顾工作与生活,选择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内阁府于2007年出台《工作与生活协调宪章》和《推进工作与生活协调行动指针》,要求国家、企业、劳动者、国民、地方公共团体五方加强协同合作,完善调整工作与生活的环境制度^[40-41]。2008—2020年,除了2011年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下中断了1次之外,其余每年都召开推进工作与生活调和的评价会议,探讨与评估政策实施后的社会效果。

2012年安倍内阁上台执政后,决定继续遵循工作与生活相互协调的方针,并修改了相关法令。2016年9月,日本政府召开“关于实现工作方式改革的会议”,并于2017年3月制定了《工作方式改革实行计划》,除了针对适龄男女劳动者之外,还包括老年人、外国人、残疾人、患慢性病劳动者,超35岁反复离职跳槽的大龄劳动者等。内容包括完善同工同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纠正过长劳动时间,改善男女职场环境,鼓励员工向高吸引力、高附加值产业跳槽等^[42]。

(三) 形成与时俱进的育人机制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目的是更有效地配合日本经济复苏。教育改革配合经济发展是日本政府的一贯做法,并且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革新教育内容,形成与时俱进的育人机制。

日本政府早已意识到教育对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早在1951年,美国结束对日占领后的一个月,日本国会便通过了《产业教育振兴法》。这一法令中指出:“产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改善国民生活的最好方法”^[43]。并且自战后发布的经济计划中都会提及教育完善问题,要求教育随产业结构的变化更新专业。从重文科转改为重理工科,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同时重视企业教育改革,形成“产、官、学”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受到日本产业界的大欢迎。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更加注重完善教育机制、经济产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安倍政府上台后,为了挽救低迷的经济,提出要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实施“育人革命”。2017年12月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一揽子计划》里明确指出“育人革命”和“生产率革命”被喻为是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的重要环节^[44]。“育人革命”是对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的教育改革,可以说涵盖了人一生阶段的教育。同时,加快幼儿学前教育无偿化,对经济拮据的青少年实施大学高等教育无偿化和补助金计划,同时强调实务实践,改组大学教育组织。在成人教育方面,开展循环教育,扩充专业实践教育培训费用,增加针对第4次产业革命技能的讲座等。重视产官学的相互融合,委托大学,专业学校等机构在全国开展包括AI、传感器、机器人、IOT、经营管理等科研计划,同时扩大面向在职员工的教育培训等等。

(四) 推广全面活跃的社会模式

20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经济实现了20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60年代颁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得日本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几乎实现了全民就业,中产阶级不断扩大,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打造了一个至今都令日本人念念不忘的“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盛况。究其原因是得益于构建了全民活跃的社会模式,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形成了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

但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泥潭的同时社会矛盾频发,“一亿总中流”打造的中产阶级居多的社会橄榄型结构面临解体的风险。虽然日本历届政府都力图挽救陷入危机的社会结构,提出要建设活力日本,建立“世界最活跃国家”,但都将侧重点倾斜于经济方面。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再次提出建设充满活力和谐的日本社会,并于2016年提出具体目标——建立“一亿总活跃”社会,因覆盖范围广泛,也被

称为“全员参与型”社会,力图从经济、社会保障两个方面积极打造活跃型的社会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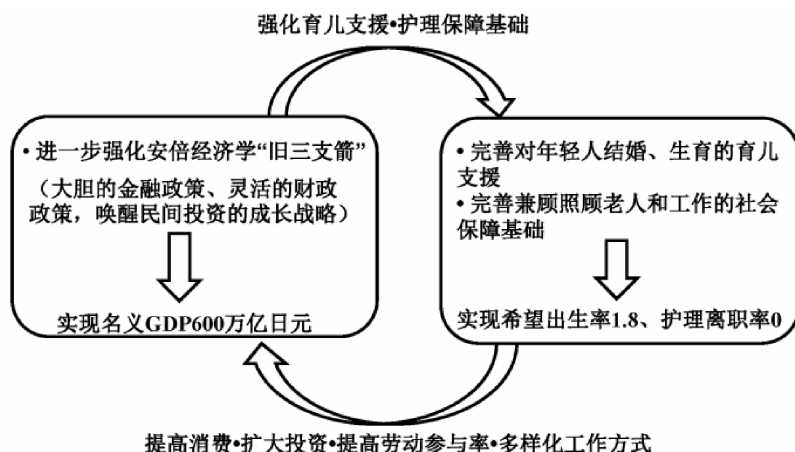


图1 “一亿总活跃社会”推动模式^[35]

资料来源:《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概要》(日本首相官网:www.kantei.go.jp. 笔者整理)

如图1所示,安倍提出的“一亿总活跃社会”的计划中,十分注重经济和社会保障之间的相互融合,主要体现在进一步强化“安倍经济学”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基础上,抓住时代科技革新机遇,从AI、医疗、节能、旅游、海外投资等16个大方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现名义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在社会保障方面,利用经济发展的成果投入到完善育儿和护理福利的基础设施中,通过多项并举逐步提高人口出生率至1.8‰,降低护理人员离职率。

具体措施如下,在生育方面,预计在2019年度所有的都道府县、指定城市和中心城市配置不孕不育专门咨询中心,完善治疗及支援手段。在育儿方面,加快幼儿学前教育无偿化,解决入托难问题,追加建设儿童课后托管场所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鼓励社区、居民、退休人员、民间教育工作者等多样化人才作为志愿者积极参与。在鼓励残障人士方面,根据个人特性来规划未来出路,与专门机构合作,在医疗、福祉、教育、出路选择和就业等方面采用助跑型支援手段。在护理高龄者方面,根据地方具体情况增加护理机构设施,提高护理人员薪资待遇。对女性群体方面,完善女性职场环境,提倡男女平等,树立性别认同的理解观念,并推动创造一个社会全体所认同的多样化环境。

四、安倍政府构建“一亿总活跃”社会的基本成效

(一)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人数稳步增长

自安倍政权二次上台执政并积极推行“安倍经济学”以来,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安倍经济学”的旧三支箭,从实施的2013—2016年的3年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发展。2013—2016年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5%^[37]。新增就业人口100万人以上,失业人口减少60万人,失业率为3.2%,达到了18年以来的低水平,有效求职倍率达到了24年以来的高水平,“一低一高”充分诠释了安倍经济学的实施在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5]。

2016年安倍在“旧三支箭”的基础上提出“新三支箭”(提升经济实力、大力支持育儿、完善社会保障基础)及构造“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后,经济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据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同比增长0.7%,名义GDP同比增长1.2%,GDP平减指数为0.6%。实际国民总收入GNI的增长率同比增长0.8%,名义GNI同比增长1.2%^[45]。就业方面,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完全失业率连续10年呈下降之势,为2.4%,完全失业人数为162万人,同比减少4万人。2019年就业人数连续7年增加,为6724万人,同比2018年增加60万人,就业率连续7年明显改善^[46]。

(二)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日本经济逐年回暖,国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2013—2016年日本国民总收入将近增加了40万亿日元,国家税收增加了15万亿日元^[47]。据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报告显示,2019年实际国民

总收入同比增长0.8%,名义国民总收入同比增长1.2%^[45]。在工资方面,通过改革日本劳动制度和工作方式,改善企业员工同工非同酬问题,正式员工人数不断扩大,企业员工工资也随之逐渐增加。同时通过政策措施鼓励女性和高龄者就业,使得兼职工作的人数也逐年显著增加。2019年正式员工人数实现5连增,总数为3503万,比2018年增加18万人。非正式员工和其他从业员人数连续6年增长,为2165万人,同比增长45万人^[46]。2019年度雇佣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较之2018年度同比增长1.2%,名义工资同比增长1.8%^[45]。

(三) 社会观念转变认同度提升

随着安倍实施“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以来,日本社会逐渐从死气沉沉中慢慢恢复活力,男女平等、工作与生活平衡、打破终身雇佣制等社会新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的认同。

2019年6月,日本NHK公布了2018年对国民意识调查的结果,有60%的受访者在女性婚后就业方面,回答“生育后继续工作”。认为“婚后最好专职于家庭”的受访者比例,由1973年该调查实施时35%的比例大幅下降到8%。在女性受教育观念方面,认为女性“应该完成大学教育”的人数从1983年的20%上升到2018年的61%。认为女性“完成硕士教育”的人数从1973年的1%上升至4%。可见日本“男女平等”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日本社会正在逐渐改变对女性的偏见。

在“国民意识调查”中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日本国民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70年代认为“工作优先”的观念占主流优势,为36%。但从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起,认为“生活和工作二者都重要”的观念逐渐占据上风,并一直延续至今。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回答“生活优先”的人数近年来平稳上升,从1974年的4%升至2018年的10%^[48]。

在终身雇佣制观念方面,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20年2月21日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的跳槽者人数为351万人,是过去人数最多的一年。相比中小企业,在大企业(500人以上)里的跳槽人数近年也逐渐增多。其中正式员工的跳槽人数同比去年增加,非正式员工转正的人数连续8年超过正式转非正式的人数。同时,回答跳槽理由方面,因“企业萧条”或“对前途感到不安”等社会因素的跳槽人数在2009年以前显著增加,在2013年后呈现下降倾向。而回答“为了寻找待遇更高的工作”为理由的人数在2013年后呈现增长趋势,到2019年时已有127万人,是2002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49]。可见,过去死板的认为终身只为一家企业工作的思想观念已经大为转变,日本国民逐渐认同丰富多样化的工作方式和行业。

五、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启示

(一) 确立经济、社会、国民三位一体的发展思维

纵观日本“一亿总中流”历史,可以发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社会逐渐失去活力,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深陷经济泥潭,经济增长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流社会崩坏”“格差社会”“贫困社会”的字眼被媒体大肆渲染。虽然历届日本政府也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也曾提出建设活力社会的目标,但政策实施效果并不明显。究其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颁布的政策措施的侧重点局限于经济方面,仅一味地把经济发展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钥匙,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社会和国民三者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

分析日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打造“一亿总中流”橄榄型社会的举措,可以发现橄榄型社会的形成并不只是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当年的日本还通过合理的人口结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针对高收入群体的高额度税收制度,形成了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活跃的“经济”与“社会模式”之间相互适应发展,才能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现如今安倍政府提出的“一亿总活跃社会”的政策举措也能验证这一点。

借鉴日本打造橄榄型社会经验,我国在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不光要从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入手,还要从思想意识上确立经济、社会、国民三位一体的发展思维模式,要将三者结合在一起,使其能相互协调,促进共同发展。

(二) 构建“四活跃”的全民社会模式

从“一亿总中流”的现象到“一亿总活跃社会”的提出,都体现了背后隐藏的日本模式。即通过产业创新刺激经济发展,使得国民收入总体得到提高,再通过社会保障等措施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从而达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的目标。具体步骤来说是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立广泛多样的劳动方式,发展与与时俱进的育人机制和推进全面活跃的社会模式这四大方面组成,这四大方面可以说环环相扣,息息相

关,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经济发展“活跃”、国民生产积极性“活跃”、思想“活跃”和社会福利“活跃”的“四活跃”全民社会模式。

因此,我国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应积极对社会保险、工作方式、育人教育、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同时还应考虑到社会各群体,特别对残障人士、心理缺陷特殊人群等,建立专门就业帮扶机构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提升社会环境质量,建立和谐的社会氛围。在职业方面,打破“铁饭碗”的思维固势,鼓励并完善各群体的创业、就业环境,努力激发各群体的活跃性。通过积极构建经济发展“活跃”化、国民生产积极性“活跃”化、思想“活跃”化和社会福利“活跃”化的“四活跃”型社会模式,激发社会活力,鼓励和刺激消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及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打造服务型政府,拉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还可以有效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形成信息、理念共享的橄榄型社会。同时社会结构与社会治理体系之间是相对应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又会导致在社会治理中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从新社会阶层崛起的角度按照“治理”理念,创新和重构社会治理体系^[50]。现代大数据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供了重要契机。

日本在安倍政府上台后,十分重视大数据的应用,尤其强调与能源、交通、医疗、农业等传统产业相结合,构造大数据技术下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在2016年提出的“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里,明确提出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实现生产率革命,要将智能化社会治理模式渗透到政府行政改革中。目前,日本从收集处理数据、应用数据和培养数据分析人才三个方面来提高大数据在国家及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例如,日本政府带头推动使用大数据,推出了电子政府和专门化大数据网站,推动政府管理电子化。同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数据,大力培养数据处理分析的专业技术人才等^[51]。

日本社会治理的经验表明,在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的潮流中,基于大数据背景下构建智能化治理模式已经成为首选。我国应积极构建大数据平台下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模式,加快转变政府大数据治理理念和智能化数据治理模式,尽快完善大数据管理的法规体系,大力培育IT数据分析人才,重视并发挥社会组织团体的积极性,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完善治理机制,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总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构建橄榄型社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入手,使用“增收”“减负”的手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缩小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同时应当积极借鉴与我国资源禀赋相似,并且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的日本经验,从确立经济、社会、国民三位一体的发展思维、构建“四活跃”全民社会模式、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三方面着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社会。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2019 中国统计年鉴[EB/OL]. [2020-3-10].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htm>.
- [2] 李香菊,贺娜.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税制研究——基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视角[J]. 华东经济管理, 2019(2): 5-13.
- [3] 吴鹏,常远,穆怀忠. 中国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基于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的考察[J]. 财贸研究, 2018(12): 14-27.
- [4] 陈宗胜,康健.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葫芦型”格局的理论解释——基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结构的视角[J]. 经济学动态, 2019(1): 3-14.
- [5] 村上泰亮. 新中间阶层的现实性[N]; 富永健一. 社会阶层构造的现状[N]. // 神林博史. 「総中流」と不公平をめぐる言説: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階層帰属意識ノート[J]. 东北学院大学教养学部論集, 2012(3): 69-70.
- [6] 高坂健次. 現代日本における「中」意識の意味—中間層論争と政治のタイプ—[J]. 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記要, 2000(86): 145-159.

- [7] 神林博史. 高度経済成長期の階層帰属意識—戦後日本における階層帰属意識ノート(1)[J]. 东北学院大学教养学部論集, 2010(156): 25-54.
- [8] 吉川徹. 「中」意識の静かな変容—階層評価基準の時点間比較分析—[J]. 社会学評論, 1999(2): 216-230.
- [9] 藤森俊辅. 中流階層帰属意識の分析—大学生の出身階層調査を素材として—(続)[J]. 岡山大学経済学会雑誌, 1983(1): 199-233.
- [10] 橋本俊詔著, 丁曼译. 格差社会[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9: 7.
- [11] 三浦展著, 陆求实, 戴译. 下流社会: 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7: 8.
- [12] 直井優. 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の変化と教育[J]. 日本教育社会学会, 1987(42): 24-37.
- [13] 尾嶋史章. 社会階層と進路形成の変容—90年代の変化を考える—[J]. 日本教育社会学会, 2002(70): 125-142.
- [14] 佐藤嘉倫. 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の流動性と格差[J]. 社会学評論, 2009(59): 632-647.
- [15] 森口千晶. 日本は「格差社会」になったのか—比較経済史にみる日本の所得格差—[R]. 一橋大学経済研究所经济社会リスク研究機構, 2017.
- [16] 王奕红. “中流社会”の名与実——日本中间层研究初探[J]. 日本学刊, 2003(6): 96-109.
- [17] 王奕红. 中日中产阶层性质特点的比较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 113-118.
- [18] 杨丽梅. 促进社会和谐的国际经验——以日本为例[J]. 科学社会主义, 2007(5): 99-101.
- [19] 李国庆. “国民皆中流”历史背后的日本社会阶层流动[J]. 人民论坛, 2014(2): 28-33.
- [20] 崔健. 论现代日本的阶级(阶层)与经济差距的关系[J]. 现代日本经济, 2007(4): 17-22.
- [21] 刘迪. 日本是如何造就中产阶级的[J]. 理论导报, 2011(1): 59.
- [22] 杜伟, 唐丽霞. 析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社会影响[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 42-45.
- [23] 张可喜.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日本“一亿总中流”社会[J]. 红旗文稿, 2013(6): 36-37.
- [24] 张车伟, 蔡翼飞, 董倩倩.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经济学动态, 2010(10): 107-111.
- [25] 张凤林. 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措施及启示[J]. 学术交流, 2011(2): 111-114.
- [26] 马晓河.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转型——国际经验教训与中国挑战[J]. 农村经济, 2011(4): 3-10.
- [27] 马晓河.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和中国策略[J]. 改革, 2011(11): 5-16.
- [28] 李实, 万海远.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环境与相关政策研究[A]//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中等收入课题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环境与相关政策研究[C].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2019: 2-73.
- [29] 秦嗣毅. 日本产业政策的演变及特点[J]. 东北亚论坛, 2003(2): 68-71.
- [30] 李晓. 七十年代以来日本产业结构政策的调整与变革[J]. 现代日本经济, 1994(1): 22-27.
- [31] 刘彩霞, 缪园. 日本的“IT基本法”和“电子日本战略”[J]. 中国信息导报, 2002(11): 40-42.
- [32] 王会霞, 刘志兵. 日本教育信息化: 从e-Japan战略迈向u-Japan战略[J].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2006(6): 62-64.
- [33] 于凤霞. i-Japan战略2015[J]. 中国信息化, 2014(13): 13-23.
- [34] 李彬. 大数据背景下日本信息产业发展成效与问题[J]. 东北亚学刊, 2015(1): 25-32.
- [35] 内阁府. ニッポン・一億総活躍プラン(概要)[EB/OL]. [2020-3-20]. <http://www.kantei.go.jp/jp/headline/ichiokusoukatsuyaku/index.html>.
- [36] 日本経済再生本部. 未来投資戦略2018—「Society 5.0」「データ駆動型社会」への変革—[EB/OL]. [2020-3-20].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kettei.html#tousi2018>.
- [37] 内阁府. 長期経済統計目次[EB/OL]. [2020-4-13]. <http://www5.cao.go.jp/j-j/wp/wp-Je07/07609000.html>.

- [38] 金周英. 日本的新五年计划[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88(8): 69-73.
- [39] 魏加宁. 评日本新的经济五年计划[J]. 管理世界, 1992(6): 128-130.
- [40] 内阁府. 仕事と生活の調和憲章[EB/OL]. [2020-6-20]. http://www.cao.go.jp/wlb/government/20barrier_html/20html/charter.html.
- [41] 内阁府. 仕事と生活の調和推進のための行動指針[EB/OL]. [2020-6-20]. http://www.cao.go.jp/wlb/government/20barrier_html/20html/indicator.html.
- [42] 内阁府. 働き方改革実行計画[EB/OL]. [2020-3-25]. <http://www.kantei.go.jp/jp/headline/ichioku-soukatsuyaku/hatarakikata.html>.
- [43] 王玉珊. 日本教育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 [44] 内阁府. 新しい経済政策パッケージ[EB/OL]. [2020-3-25]. <http://www.cao.go.jp/keizai/package/package.html>.
- [45] 国民経済計算部. 2019年10-12月期GDP速報(2次速報値)[EB/OL]. [2020-4-13]. <http://www.esri.cao.go.jp/jp/sna/menu.html>.
- [46] 総務省統計局. 労働力調査基本集計2019年平均結果の要約[EB/OL]. [2020-4-20]. <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sokuhou/nen/ft/index.html>.
- [47] 内阁府. ニッポン・一億総活躍プラン[EB/OL]. [2020-3-20]. <http://www.kantei.go.jp/jp/headline/ichiokusoukatsuyaku/>.
- [48] 日本NHK放送文化研究所. 第10回日本人の意識調査の結果について[EB/OL]. [2020-4-20]. http://www.nhk.or.jp/bunken/research/yoron/20190614_1.html.
- [49] 総務省統計局. 増加傾向が続く転職者の状況~2019年の転職者数は過去最多~[EB/OL]. [2020-4-28]. <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topics/topi1230.html>.
- [50] 张海东, 杜平. 从新社会阶层的崛起看社会治理创新[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2): 49-55.
- [51] 张冠楠. 大数据时代: 日本在做什么[EB/OL]. [2020-4-28]. http://www.epaper.gmw.cn/gmrb/html/2018-05/29/nw.D110000gmrb_20180529_1-12.htm.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Japan's Overcoming Middle-income Trap

ZHANG Ying^{1,2}, XIE Yan¹

(1. China-Japan-Korea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2.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1, China)

Abstract: How to across the middle-income gap and build an olive-shaped society successfully has already becomes an important go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China. Japan had been formed a systematic developed model by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and creating a stable olive-shaped societ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in Jap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Japanese model of the measures and experiences in building an olive-shaped society from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labor system, educational mechanism and social model; and holds tha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creasing Japan's national income, stabilizing the number of employed people and enhancing the degree of social identity. Given the Japan's experiences, China should build an olive-shaped society from three aspects: establishing the triune development thinking of economy, society and national people; constructing the "four active" social model for the whole national people,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technology.

Key words: Japan; Middle income group; Olive-shaped society

(责任编辑: 沈 五)